

7.2 证据委员会的建议

前面的章节提供了支持以下建议的环境、问题、潜在解决方案和共享词汇。这些章节可供多人使用，而不仅仅是那些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人。然而在这里，我们把重点放在那些最有能力做出必要变革的人，以确保通过一致的方式使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这主要包括：

- 多边组织，如：联合国系统、多边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二十国集团（G20）等
- 国家和次国家各级政府的政策制定者
- 组织领导、专业人士和公民
- 证据中介，包括那些目前不充当证据中介的人员（例如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者）
- 证据生产者，特别是那些从事生产和支持使用数据分析、建模、评价、行为/实施研究、定性见解、证据综合、技术评估/成本效果分析和指南，并以影响力为导向的单位。

在此，我们以信息图的形式概述了证据委员会的24条建议，并于下方表格中进行了详细阐述。八条最重要的建议（1、3、4、5、13、14、15和24）使用粗体表示。它们的重要性源于它们如何提供框架[1, 4, 13]、结构和流程[5, 14, 15]、责任[3]或资金[24]，许多其他行动可以遵循这些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这些建议（如报告的其它部分）中使用“证据”一词表示研究证据，特别是第四章中描述的所有八种形式的证据（数据分析、建模、评价、行为/实施研究、定性见解、证据综合、技术评估/成本效果分析和指南）。我们使用的“最佳证据”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国家（或次国家）背景下——从最佳可用研究中得到的国家（或次国家）证据（即在背景中学到了什么）和从最佳可用证据综合中获得的全球证据（即从世界各地学到了什么，包括其不同群体和环境下的差异）。



所有可以采取行动的人

两条建议，一条是警示[1]，另一条是提出新的回应标准，即任何时候提出的主张（如这种干预措施是有效的）要求提供证据时的回应标准[2]



多边组织

两条建议，一条呼吁多边组织做出决议[3]，另一条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4]



政府政策制定者

七条建议：

- 四条呼吁建立符合目的的国家（和次国家）证据支持系统（和更广泛的证据基础设施）[5]、证据支持人员和伙伴关系[6]、科学顾问[7]和咨询机构[8]
- 一条呼吁建立更多样化的证据库[9]
- 两条与开放科学[10]和人工智能[11]相关



组织领导、专业人士和公民

两条建议：

- 要求每个重要的组织协会、专业机构和以影响为导向的民间社会团体对其国家（或次国家）的证据支持系统做出有意义的贡献[12]
- 一条是呼吁公民考虑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佳证据的多种方式，并考虑支持能够实现这一点的政治家（和其他人）[13]



证据中介

三条建议：

- 一条针对专门的证据中介[14]，另一条针对新闻和社交媒体平台[15]
- 一个更普遍的要求是及时并响应迅速地将最佳证据与所提问题相匹配[16]



证据生产者

七条建议：

- 五条解决以下方面的作用：1) 填补空白并遵守标准[17]；2) 响应、转介或与他人合作[18]；3) 向其他部门的证据小组学习[19]；4) 为全球紧急情况做好准备[20]；和5) 使证据易于理解[21]
- 一条专门针对学术机构[22]，另一条针对期刊[23]



资助者

一条建议呼吁在证据支持方面支出“更明智”，理想情况下更多，尤其是在国家（和次国家）证据支持系统和更广泛的证据基础设施方面[24]

证据委员会提出以下24条建议。为更容易识别最重要的八条建议（1、3、4、5、13、14、15和24），它们前方附有一个包含建议编号的彩色圆圈，并包含在具有相同颜色外框的文本框中。对于每条建议，我们都列出报告的相关章节，提供支持该建议的环境、概念或词汇（按其介绍的顺序排列）。在相关的情况下，我们还列出了与证据委员会建议一致的全球报告。全球委员会的报告通常仅与建议的一部分或其理由相一致（如关注公平性，投资于某些特定形式的证据（例如评价）以及让决策者承担责任），而来自其他全球实体的报告往往更加一致。



所有决策者、证据中介和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证据生产者

1

敲响警钟—决策者、证据中介和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证据生产者应该认识到问题的规模和性质。政府政策制定者、组织领导、专业人士和公民并未系统地使用本报告中提到的所有八种形式的证据以公平地应对社会挑战。相反，决策者往往依赖于低效（有时是有害）的非正式反馈系统。结果则是糟糕的决策，导致无法改善生活，对公民造成可避免的伤害以及资源浪费。

参与COVID-19决策的决策群体，特别是高级别政府政策制定者，目前对使用多种形式的证据和利用支持其使用的策略有了直接经验。他们对导致证据被忽视或滥用等可能出现的挑战也有直接经验。他们可能还听说其他国家的同行可以获得的证据支持，如动态证据综合，并想知道为什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不可获得或不可使用这些证据。这个群体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将大流行之前和期间成功经验系统化，并建立或改进各自国家的证据支持系统，以解决不成功的地方。

相关章节: 4.13众多COVID-19证据支持系统的不足 | 6.2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公平分配能力 | 4.1决策中常见的证据形式 | 4.7 动态证据产品

2

要求证据的新标准—当提出主张时，所有决策者都应注意并询问其所依据的证据质量和适用性。专家和其他提出主张的人（如这种干预措施有效）可能是依赖于他们的个人经验或现有证据的一个部分。他们可能对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事情过于自信。与其依赖专家作为唯一的证据来源，决策者也可以寻找最佳证据来源，如“一站式服务”，其中包含使用适当分类法组织的证据综合，且各部分证据在考虑质量、时效性和其他决策相关因素后评估。他们可以让专家发挥其他作用，如研究特定的证据综合对特定管辖区的意义，以及对不同形式证据的思维方式提出挑战。

相关章节: 4.5高质量证据和低质量证据的区分 | 4.8最佳证据与其他证据的对比（以及如何从其他证据中获得最大收益） | 4.11 错误信息与信息疫情



3

多边组织的决议—联合国、G20和其他多边组织应通过一项决议，使这些多边组织及其成员国承诺扩大其对证据的概念，并支持与证据有关的全球公共产品以及公平分配生产、分享和使用证据的能力。旨在支持联合国从2021年到2025年转型的“变革五要素”明确包括数据分析和行为/实施研究，隐含地包括评估（在“绩效和结果导向”下），但对其他所需的证据形式却未提及。(1)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包括它们赞助的全球委员会）继续依赖“专家最了解”的模式。联合国秘书长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振兴提供了一个可以做得更好的机会。(2)可以从那些率先采用更系统、更透明的证据使用方法的组织中学到很多东西，如：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指南审查委员会（制订规范性指南）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相关章节:4.2常见证据形式的定义 | 6.1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 6.2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公平分配能力 | 5.5联合国下属机构在其工作中对证据综合的使用 | 7.1全球委员会建议分析的启示 | **统一报告:** (3)

4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世界银行应在即将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专门提供全球、区域和国家所需的证据体系架构设计，包括对与证据相关的全球公共产品以及公平分配的证据生产、分享和使用能力的必要投资。世界银行向“知识银行”迈进的步伐过于试探性。他们迄今为止的工作强调了某些形式的证据（如数据分析），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其他形式（如证据综合）。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可以建立一种关于证据和证据使用的通用语言，即决策者、证据中介和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证据生产者等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它还可以列出许多做得更好的步骤，包括世界银行的作用，以及其全球伙伴关系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在支持与证据相关的全球公共产品（如证据综合）方面的作用。

相关章节:6.1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 6.2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公平分配能力 | 1.6使用证据应对社会挑战的关键事件时间线 | **统一报告:** (4)



5

国家（和次国家）的证据支持系统—每个国家（和次国家）政府都应该审查其现有的证据支持系统（和更广泛的证据基础设施），通过内部和伙伴关系填补差距，并公开报告进展。例如，许多政府没有证据支持协调办公室、行为洞察部门、证据使用手册和相关指标，以及理想证据支持系统的其他特征（如4.14节所述）。每个政府还可以审查其“主流”结构和程序（如预算、规划、监测和审计），以正式确定证据的“输入方式”。若没有正确的证据支持系统，工作人员将没有能力、机会和动力在政府决策中使用证据。

一些政府可能会选择在立法中正式规定其效力，如美国的《循证决策基础法案》。许多政府还可以支持在组织领导和专业人士的日常工作以及公民的日常生活中使用证据，并在其工作中明确尊重原住民权益及其认知方式。

相关章节: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 | 3.3政府政策制定者及其使用证据的环境 | 4.10原住民权益及其认知方式 | **统一报告:** (3)

6

工作人员、合作伙伴和其他资源—政府政策制定者应确保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能够获得证据支持所需的工作人员、合作伙伴和其他资源。参与支持政府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项目、技术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即为政府提供证据“吸收能力”的工作人员）需要及时了解证据使用的进展。他们需要与专业的证据生产者和中介建立伙伴关系（包括技术支持安排），以补充其内部能力以及应用这些能力所需的其他资源（例如在线文件访问）。

相关章节:3.3政府政策制定者及其使用证据的环境 | 5.3证据中介使用的策略 | 6.2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公平分配能力 |
统一报告: (3-5)

7

科学顾问—政府政策制定者应根据以下能力选择他们的科学顾问：发现、本土化和交流不同类型的证据；维持高效能证据支持系统。许多科学顾问是根据他们过去的科学贡献或与高级政府官员的关系来选择的。就像政策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科学顾问需要紧跟使用证据的许多进展。此类证据包括本报告中讨论的八种形式的证据，来自健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以及跨部门的证据。其中许多类型的证据现在都可以作为动态证据产品。

相关章节:3.3政府政策制定者及其使用证据的环境 | 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 | 4.2常见证据形式的定义 | 4.7动态证据产品

8

咨询机构—政府政策制定者应在证据使用中对咨询机构提出更高的标准。许多咨询机构并未结合使用本土最佳证据（例如来自国家或次国家层面的数据分析）和全球最佳证据综合，也未将正确的证据类型与正确的决策相关问题相匹配。他们通常不使用稳健的审议程序，包括让那些能够从公平的角度解释证据对特定群体意味着什么的个人发言。他们通常也不会区分基于最佳证据的建议和未基于最佳证据的建议。

相关章节:4.4本土证据和全球证据的相互作用 | 4.3匹配决策相关问题与证据形式 | 1.7公平性考虑 | 4.5高质量证据和低质量证据的区分

9

建立更加多元化的证据库—政府政策制定者应补充其对数据收集和共享的一般支持，特别支持更多样化的证据库，以公平性为导向为决策提供信息。全球委员会报告一直在宣扬“大数据”的价值，但他们却没有指出什么是可靠的数据分析，数据分析可以用于回答哪些问题，以及如何用其他形式的证据来回答数据分析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也几乎没有提到需要更好地利用各种形式的现有证据，通过所有拟议的投资建立多元化的证据基础，并在共享现有证据和新证据时提高信噪比。

相关章节:7.1全球委员会建议分析的启示 | 4.3匹配决策相关问题与证据形式 | 4.5高质量证据和低质量证据的区分 | 1.7公平性考虑 |
统一报告: (4; 6-13)

10

开放科学—政府政策制定者应激励开放科学，将其作为在决策中使用证据的关键推动因素。共享匿名数据、物理样本和软件（如用于建模的软件）—同时确保有适当的标准以确保数据隐私—使许多类型的数据分析和评估成为可能。解决导致接受公共资助的研究人员将证据综合等全球公共产品置于出版商“付费墙”之后的因素，将有助于决策者、证据中介以及其他证据生产者获得他们所需的证据。

相关章节:6.1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
统一报告: (14)

11

人工智能—政府政策制定者应确保人工智能（AI）的监管制度和持续的验证计划，以优化人工智能对证据支持系统的益处，并将其危害降至最低。机器学习和其他方法在数据分析、证据综合和其他形式的证据方面创造了大量的新机会，但也有很大的潜在危害。例如，这些方法可能会无意中延续或增加歧视的风险。政策制定者还可以与研究人员合作，确保这些分析方法得到透明报告、审慎复制、正确解释和使用。特别是，得出因果推论的能力往往被高估，导致在决策中做出不恰当的解释和使用。

相关章节: 4.7动态证据产品 | 统一报告: (15)



组织领导、专业人士和公民

12

来自组织协会、专业机构和民间社会团体的贡献—每一个重要的组织协会、专业机构和以影响力为导向的民间社会团体都应审查其对国家（或次国家）证据支持系统（和更广泛的证据基础设施）的贡献，通过内部和伙伴关系填补空白，并向成员报告进展。大多数组织以及几乎所有的专业人士和公民都需要能够依赖的证据支持系统，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解决利益冲突并避免“杜撰”。组织协会（如代表和支持学校董事会的协会）和专业机构（如代表和支持社会工作者的机构）可以成为国家（和次国家）证据支持系统的关键部分。民间社会团体可以要求所有这些团体对他们如何支持使用证据来解决社会挑战负责。

相关章节: 3.4组织领导者及其使用证据的环境 | 3.5专业人士及其使用证据的环境 | 3.6公民及其使用证据的环境 | 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 | 统一报告: (11;16;17)

13

日常生活中的证据—公民应考虑根据最佳证据就其及家人的福祉做出决定；把钱花在有最佳证据支持的产品和服务上；自愿为那些使用证据来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做的倡议投入时间和进行捐款；支持那些致力于使用最佳证据来解决社会挑战，以及那些承诺（与其他人一起）支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证据的政治家。除其他外，政府政策制定者需确保公民能够获得最佳证据、经证据核实的主张，以及易于使用的有证据支持的资源和网站等，以便在任何时候做出明智的选择，而不仅仅是全球危机期间。他们还需要帮助建立公民的媒体和信息素养，提供必要的透明度，让公民知道决策、服务和倡议是否基于最佳证据的，并更广泛地创造一种理解、重视和使用证据的文化。

相关章节: 3.6公民及其使用证据的环境 | 4.11错误信息和信息疫情 | 统一报告: (3;5;10;16;18;19)



证据中介

14

专门的证据中介—专门的证据中介应该挺身而出，填补政府留下的空白，在政府工作人员频繁更替时提供连续性，并利用与全球网络的紧密联系。证据中介介于决策者和证据生产者之间，为前者提供最佳证据支持，为后者提供利用证据产生影响的洞察力和机会。与政府的科学顾问一样，中介需要能够发现和交流各种形式证据，并维持（至少是一部分）高效能的证据支持系统。COVID-19已经在某些国家的某些时候显示出中介与社区领袖合作的价值，即让那些过去可能因不当生成、共享或使用的证据而受到不良服务的人参与进来。

相关章节: 5.1证据中介的类型 | 5.3证据中介使用的策略 | 4.2常见证据形式的定义 | 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 | 1.7公平性考虑 | 统一报告: (8;20)

15

新闻和社交媒体平台—新闻和社交媒体平台应与可以帮助利用最佳证据来源的专门证据中介，以及可以帮助有效传达证据和确保其算法呈现最佳证据并抨击错误信息的证据生产者建立关系。新闻工作者和事实核查人员需要熟悉证据综合，并利用它们就获得的任何证据以及可用于替代最佳证据的任何“其他事物”提出具体问题。熟悉的证据综合包括：在更广泛的证据体系中本土化和定位新研究的重要性；与单一、小型、执行不力的研究相比，更倾向于综合高质量研究的理由；科学不确定性的概念；证据的演变性质及其与新兴和替代指南的联系；偏倚和利益冲突的重要性；以及避免“杜撰”报告的重要性。

相关章节: 5.1证据中介的类型 | 4.4本土证据和全球证据的相互作用 | 4.8最佳证据与其他证据的对比（以及如何从其他证据中获得最大收益） | 4.11错误信息和信息疫情 | 统一报告: (21; 22)

16

及时和响应迅速地将最佳证据与所提问题相匹配—所有的证据中介都应以一种及时和响应的方式支持使用最佳证据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或考虑到决策者感兴趣的领域应提出的问题）。某些形式的证据可以帮助回答关于问题的问题（如数据分析）；其他形式的证据可能有助于回答关于解决问题的选择或实施策略的问题（如效益、危害和成本评估）。全球最佳证据的综合需要与本土最佳证据，以及其他类型的分析（如政策、系统和政治分析）相辅相成，以帮助理解影响证据是否以及如何被使用的背景因素。需要创新的新证据产品来描述最佳证据的组合。

相关章节: 4.3匹配决策相关问题与证据形式 | 4.4本土证据和全球证据的相互作用



以影响力为导向的证据生产者

17

填补空白并遵守标准—证据工作组应预测并填补各自证据形式的空白，且遵守其标准。很多优先主题没有可用的证据综合，而很多主题有较多的可用证据综合。很多证据综合质量低下且已过时。在全球大流行的近两年里，COVID-19的情况就是如此。

相关章节: 4.6证据综合的覆盖面、质量和新近度 | 4.5高质量证据和低质量证据的区分 | 统一报告: (3; 23)

18

响应、转介或与他人合作—证据工作组应发挥其比较优势，与具有互补比较优势的工作组合作，帮助在本国建立更好的证据支持系统和更好的全球证据体系架构。证据工作组可以响应与他们提供的证据形式最匹配的问题类型。他们可以将其他问题转交给其他工作组。他们也可以以集体影响为导向，与其他工作组合作以生产更多的综合证据产品。这些证据产品可以结合本报告中描述的多种形式的证据，来自健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以及跨部门的证据。证据工作组可以将判断力、谦逊和同理心带到他们所做的一切中，并鼓励那些共享和使用证据的人也这样做。

相关章节: 4.3匹配决策相关问题与证据形式 | 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 | 6.1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 6.2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公平分配能力 | 统一报告: (3)

19

向其他部门的证据工作组学习—为适应其他部门的创新，证据工作组应该持开放的态度。Cochrane开创了许多方法来综合有关健康方面的研究，包括动态证据综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开创了许多方法来模拟人类长期引起的气候变化。Cochrane和IPCC可以相互学习，其他人也可以向他们学习。

相关章节: [4.4本土证据和全球证据的相互作用](#) | [4.7动态证据产品](#)

20

为应对全球突发事件做好准备—证据工作组应确保在全球突发事件发生时，他们能够灵活地转向新的主题。许多COVID-19全球委员会在“新冠疫苗、新冠诊断和治疗”领域开展基础研究。他们没有阐述研究的目的，因为证据将决定这些产品能否应用于需要它们的人身上。专注于这些更广泛问题的证据工作组将不可避免地回到其现有的重点领域，但需要做好准备，便于重新关注一场大流行或其他全球突发事件。全球委员会也没有提出需要为随机对照试验和其他研究，以及国家证据支持系统和更广泛的全球证据体系架构（无论是“准备就绪”，还是已投入使用）制订计划书。

相关章节: [7.1全球委员会建议分析的启示](#) | [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

21

使证据易于理解—证据工作组应该准备“衍生产品”，将我们知道的内容（以及确信程度）以对目标受众有意义的方式传达出来。由于建模尚不存在类似于其他类型的证据质量标准，建模者需要充分公开分享其模型的详细信息，便于其他人进行评价（例如，模型的结构、使用的数据、一致性及其应用的软件或工具）。沟通方面的考虑包括决策者的信息需求、易于掌握关键信息并在有兴趣的情况下进行更深入挖掘的格式（有时称为分级条目）、通俗的语言措辞以及翻译成其他语言。

相关章节: [4.5高质量证据和低质量证据的区分](#) | [5.3证据中介使用的策略](#) | [统一报告: \(24\)](#)

22

学术机构的责任—学术机构及其公共资助者应激励教职员员工为其国家（或次国家）的证据支持系统和与证据相关的全球公共产品做出贡献。现有的激励机制倾向于只奖励经过同行评审的资助和出版物，以及率先就某一主题发表的文章，而不是为更具权威性研究做出贡献。一些国家正在利用定期的机构评估活动来推动对证据影响的更多关注（例如英国卓越研究框架（UK’s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额外的激励措施可以奖励实现影响所需的工作（例如，与决策者的接触和回应），并支持最佳证据（例如，优先考虑出版物的质量而非数量，以及交流来自证据体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单一研究的见解）。为了更清晰地了解资助者和慈善家，我们鼓励人们关注单一研究的媒体发布和媒体采访，而不是“为黄金时段做好准备”的最佳证据。

相关章节: [5.4证据中介的促进与阻碍条件](#) | [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 | [6.1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 [4.5高质量证据和低质量证据的区分](#) | [4.8最佳证据与其他证据的对比（以及如何从其他证据中获得最大收益）](#)

23

期刊的责任—期刊出版商应改进他们支持使用最佳证据的方式。期刊可以要求审稿人使用报告指南和严格评价清单，将单个研究置于证据综合的背景下，并共享匿名的研究数据。他们还可以承诺发表阴性的研究报告和复制的研究，避免“杜撰”，并在获悉学术不端时迅速采取行动。期刊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及时发布更新后的动态证据。期刊还需确保出版延迟不会妨碍决策所急需证据的公开共享（反之，公开共享也不妨碍未来在期刊上发表）。

相关章节:5.4证据中介的促进与阻碍条件|4.5高质量证据和低质量证据的区分|4.4本土证据和全球证据的相互作用|6.1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



资助者

24

资助—政府、基金会与其他资助者理论上应在证据支持上“更聪明”，理想状态下应投入更多的资金。他们可以承诺确保将1%的资金分配给国家（和次国家）的证据基础设施（如第4.14节所述，为证据支持系统和证据实施系统提供合理的份额），同时监测标准的遵守情况。如果世界银行和其他联合国机构等多边组织未承担分配这一责任，他们可以确保将10%的资金分配给与证据相关的全球公共产品。高收入国家政府和全球资助者可以将其国际发展资金的1%用于公平分配的证据使用能力。

相关章节:4.14国家证据基础设施的理想特征|6.1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全球公共产品|6.2支持证据使用所需的公平分配能力|**统一报告:**(3)

正如两党政策中心的Nick Hart所指出的（在关于美国知证决策委员会、《证据法案》以及随后的行政备忘录的系列播客中也提及），即使两党经常无法就证据的内容和其对特定环境下的意义达成一致，也应该支持建立和使用证据。(25)

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世界各地的决策者（例如，政府政策制定者、组织领导者、专业人士和公民）都需要最佳的证据来应对社会挑战。为满足需要，我们不能只是为下一次的全球突发事件做准备，然后看着这些准备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转向其他挑战而被瓦解。世界需要一个灵活、方法强大且公正的证据基础设施，可以与为任何特定社会挑战带来特定专业知识的人相交。我们需要全球公共产品和公平分配能力来生产、共享和使用最佳的证据。我们一方面需要能力、机遇和动机，另一方面也需要判断力、谦逊和同理心。



政府政策制定者 *Andrew Leigh*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将经济学和法律培训引入公共政策写作和辩论

参与本报告的编写和委员之间的讨论改变了我的想法，即我个人可以做些什么，我所在的国家需要做些什么，以及我希望看到多边组织做些什么。

就个人而言，第4.8节《最佳证据对比其他证据》（best evidence versus other things）是我最喜欢的部分。这里有很多关于如何从“其他证据”中获得更多信息的明智建议，像我这样的民选官员会定期收到这些建议，例如一份预印本、一位有意见的专家、一个提供建议的专家小组和一份辖区范围经验综合。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随机试验的书。而现在，在完成本报告后，我对随机政策评估的必要性更感兴趣。试验的优势之一在于它们很容易向公民解释，它们帮助我们解决公民对“技术官僚主义”的担忧，在这种担忧中，普通民众认为他们会被自己不理解的决策过程欺骗。对政府的信任不仅仅在于做出正确的决策，而在于做出公民认为正确的决策。

评估不是只与精英有关的问题。证据是为每个人准备的。我们的报告为个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提供建议。如果你是正在研究有关戒烟或减肥证据的个人，那么你应该查看证据综合，而非单一研究。如果你是一名撰写健康相关文章的新闻工作者，那么你可以成为Cochrane的常客，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数千个主题相关的精炼证据。对于报道社会政策的媒体，Campbell协作网可以提供同样的服务。我们的报告建议政府在决策中更好地使用证据，并通过严格的评估建立证据库。国际组织应更多地依赖证据，世界银行也应该准备一份关于证据使用最佳实践的里程碑式报告。

国际组织在证据的使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报告采用了非常严格的方法对有关全球变暖及其后果的证据进行筛选和分级。其他全球机构在证据的使用方面系统性较差，也较常依赖于单一的研究，且当存在大量同行评审文献时仅引用专家意见，或是在差别很大的环境下推断证据。这并非是国际机构想要歪曲科学问题，他们反而热衷于改进，外部专家可以基于各个机构所公布的如何使用证据决策对报告进行评估，从而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正如第5.5节所述，从2007年开始，“点名羞辱”对世界卫生组织（WHO）使用证据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联合国系统的其他部门也需要效仿WHO的领导。

在慈善组织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高质量的评估可以创建一个良性循环：让无效的项目逐渐减少，有效的项目扩大规模。快速发展的有效利他主义运动要求慈善机构为其影响力提供严格的证据。例如，据GiveWell.org估计，对于两个一流的慈善机构（抗疟疾基金会和疟疾联盟），其项目每增加4500美元，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这是捐助者支持这些慈善机构的强大动力。更多来自其他慈善机构直接影响的证据可能有助于推动良性竞争和发展。

“